

惟硯作田

上海博物館藏硯精粹

Literati's Farmland

Selected Ink-ston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田作砚惟

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

Literati's Farmland

Selected Ink-ston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上海博物馆

Shanghai Museu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惟砚作田：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 / 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479-1035-1
I．①惟 II．①上 III．①砚－收藏－中国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4274号

惟砚作田
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

上海博物馆 编

主 编 杨志刚 陈克伦
责任编辑 王 彬 凌瑞蓉
审 读 朱莘莘
装帧设计 姚伟延 张晶晶
图像制作 白瑾怡 童晨琦
技术编辑 钱勤毅 陈 凌
印装监制 朱国范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 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163.com
设计制作 上海贝贝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635×960 1/8
印 张 36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501-2,500

书 号 ISBN 978-7-5479-1035-1
定 价 240.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CONTENTS

6 前 言 Foreword

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馆长

Yang Zhigang Director, Shanghai Museum

8 上海博物馆藏砚与砚史相关问题

The Ink-stones in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and Proposition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Ink-stones

华慈祥 *Hua Cixiang*

22 第一部分 实用与气度 Practicality and Liberality

46 第二部分 粗犷与厚朴 Boldness and Conciseness

82 第三部分 良材与精工 Exquisite Material and Craftsmanship

212 第四部分 近世巨匠 Modern Master

278 索 引 Index

田作砚惟

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

Literati's Farmland

Selected Ink-ston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上海博物馆
Shanghai Museum

目 录 CONTENTS

6 前 言 Foreword

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馆长

Yang Zhigang Director, Shanghai Museum

8 上海博物馆藏砚与砚史相关问题

The Ink-stones in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and Proposition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Ink-stones

华慈祥 *Hua Cixiang*

22 第一部分 实用与气度 Practicality and Liberality

46 第二部分 粗犷与厚朴 Boldness and Conciseness

82 第三部分 良材与精工 Exquisite Material and Craftsmanship

212 第四部分 近世巨匠 Modern Master

278 索 引 Ind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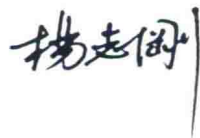
前言

砚亦称研，是研墨的器具。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房器用，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砚的起源甚早，其前身为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具，而迄今所知最古的成型石砚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早期砚注重功能性，至唐宋时期，文人开始关注砚的造型与用材，端、歙名石为世所重。明清时期是砚史的高峰，不惟形制多样，选材亦应有尽有，蔚为大观。

上海博物馆所藏历代古砚品类丰富，尤以明清文人题铭砚、著录砚与近世巨匠陈端友制砚为馆藏特色。本次展览旨在通过这些精品佳作展现砚史的发展脉络。

青灯黄卷，惟砚作田，古代文人终生与砚相伴，砚田耕耘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赏玩这些古砚，如晤古贤，如对先哲，在理解独特的传统书写文化之同时，我们仿佛可以触及历史人物的幽怀雅抱，由此感受中华文明最为深邃的内在世界。

上海博物馆馆长



FOREWORD

An ink-stone is a mortar for grinding ink-ingots. As a traditional stationery imple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its predecessor – the grinding tool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 earliest ink-stone was unearthed in the Shuihudi Qin dynasty tomb, Yunmeng, Hubei Province. Early ink-stones were made more for their functional usage.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terati have been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ppearance and material of ink-stones. Duan stone and She stone became highly value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rked the peak of the history of ink-stone. The ink-stones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of various designs and materials.

Shanghai Museum has a rich collection of ink-stones of all dynasties and various categorie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pieces are the ink-stones with literati inscriptions and the recorded ink-stones in literati's catalogues of the Ming-Qing period, as well as the ones made by modern master Chen Duanyou. Via these masterpieces the exhibition intends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nk-stones.

Under the dim lamp light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used brushes as plows and ink-stones as farmlands. Plowing through scrolls is the only way to live their dreams. Looking at these ink-stones is like meeting these ancient scholars face to face. By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writing, we will have a sense of the sentiments and aspiration of the literati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most profound inner worl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ang Zhigang

Director, Shanghai Museum

上海博物馆藏砚与砚史相关问题

华慈祥

一、上海博物馆藏砚

上海博物馆是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重要机构，尤以古代青铜、书画和陶瓷的收藏而著称于世。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博物馆，工艺杂项类文物是上博众多收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品位较高的古砚也不乏精彩之作。

砚的收藏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两次高潮，分别是宋代和清代。

宋代由于文化的繁荣和文人阶层的壮大，文人雅士们对几乎是文人专属的砚兴趣盎然，而对宋以前的砚更是痴迷。其收藏的古砚涉及到六朝、唐的名人用砚和形制、纹样较为罕见的砚台。

如果说宋代对于古砚的收藏还只是文人雅兴所致，那么，到了清代，古砚则纳入宫廷典藏之列。乾隆四十六年（1781）编撰完成的《西清砚谱》便是对清宫古砚收藏的总结。

民国至现代，古砚收藏者众多，以机构收藏为主为精，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等皆有精品。上海博物馆古砚的收藏亦有特色，自上世纪50年代建馆初期至今，通过征集、捐赠、移交、考古出土等不同方法，已有数百方归藏。

馆藏古砚总量有数百方，宋以前的较少，两汉魏晋的只有5方，为圆饼形石砚、板砚、带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砚和三足瓷圆砚。其中2方西汉石砚为上海地区出土，另3方为征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上海青浦福泉山西汉晚期20号墓出土圆饼形石砚一方，并附有研石。唐砚共计8方，砚形为箕形、辟雍形和龟形。

馆藏宋、金砚有十余方，砚形有箕形和抄手形。上海青浦福泉山北宋墓出土的箕形石砚，是宋代典型的箕形砚。另外2方北宋抄手砚，砚背皆有长刻铭。铭文记录了砚的制作日期、产地、材质、工艺和制作者。为我们研究宋砚留下了较为详实的资料信息。

馆藏元砚有4方，为箕形、圆形和长方形。其中3方为1952年上海青浦重固镇高家台元代晚期任氏家族墓出土，分别是嵌端石连盖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圆形三足歙砚，是元砚中的标准器。3方出土砚中有2方是所谓的蓬莱砚，而传世的蓬莱砚较多，一般认为是宋代的，此二砚的出土，对界定传世蓬莱砚的确切时代提供了依据。

馆藏明砚有数十方，主要为箕形、抄手形、圆形和长方形。大多为移交、征集而来，有确切考古出土的较少。馆藏1966年上海宝山顾村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箕形端砚，砚形与早期箕形砚几乎一样，只是双圆缩小，与早期较为粗壮的足相比尤显单薄，是研究晚期箕形砚的第一手资料。

传世的明砚中，馆藏部分文人题铭砚引人关注。如永乐十三年（1415）沈度铭箕形端砚、袁褰端砚、陈洪绶铭抄手端砚，都是砚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品。

馆藏清砚有二百余方，除了传统的箕形、抄手形、圆形和长方形之外，仿植物、仿古、几何形等各种样式的亦有收藏。清代的文人题铭砚是馆藏古砚的重点，有近八十方，涉及到的文人有吕留良、纪昀、高凤翰、翁

方纲、伊秉绶、张燕昌、阮元、袁枚、费丹旭、张廷济等等。其中康熙四年（1665）吕留良铭端砚、雍正五年（1727）高凤翰铭田田端砚、嘉庆九年（1804）纪昀铭螭纹端砚等名砚分别著录于《广仓研录》、《砚史》、《阅微草堂砚谱》。

馆藏的另一收藏特色是20世纪制砚家陈端友刻砚。陈端友是近现代最著名的琢砚大师，馆藏其砚作三十余方，如松蕈形嶮村石砚、甜瓜端砚、竹节端砚、古钱端砚、九龟荷叶形端砚等，精品聚集。

二、汉晋砚形特征与相关问题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贡献重大，故有“文房四宝”之誉。在文房四宝中，砚位居末席，只是笔墨纸三宝乃有机物，不易留存，而砚质地坚实，出土与传世的古砚有相当数量，故成为今人研究文房四宝中的重点。

砚亦称为研，汉末刘熙《释名》曰：“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指出砚是研墨的工具。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套陶器彩绘的研磨器具是砚的前身。而迄今所知最早的砚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石砚，共有2方，为不太规则的圆饼形，用鹅卵石加工制成。从此，拉开了二千多年古砚发展的序幕。

近几十年以来，汉晋古砚有大量的考古出土，为研究该时期砚形的特征提供了实物佐证。

考察砚的早期形态，战国秦汉至六朝初期流行的砚形有圆饼形砚、板砚（所谓黛砚、黛板）和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西汉时期多见圆饼形砚，东汉时在圆饼形砚的基础上，发展出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板砚则是汉代最普及的砚形。东汉的三足石砚制作精美，艺术水平高，是砚史上的奇葩。圆饼形砚、板砚的材质以石料为多，也见有陶质。

此阶段与砚同出的往往有研石，亦称研子（也见陶质），是用来压着墨以磨出墨汁的，这是因为战国秦汉墨多为丸状，尺寸偏小，不能手持墨直接在砚上研磨，故需要研子。

汉砚中的圆饼形砚与板砚属于砚的初级形态，形制简朴，以实用为目的。东汉的有盖三足砚则充分展示了汉砚的浑厚与恢宏。汉砚的风格与汉代的社会思想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汉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使中国古代文化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汉代的工艺美术在历史上的成绩突出，意义深远，鲁迅先生以“深沉雄大”予以高度评价。工艺美术作品具有注重整体刻画、大局安排，朴素而不单调，粗犷而不鄙野，浑厚而不凝滞，豪放而不疏散，充满着大胆的印象、夸张，有一种飞扬、流动的感觉，有一种“气势”之美。

东汉的有盖三足砚充分展示了汉代工艺美术“深沉雄大”的气势美。砚盖都为动物造型，无论是馆藏的卧虎盖，还是鸟形盖^[1]、龙形盖^[2]、兽形盖^[3]等，都诠释了汉代工艺的艺术特点。

馆藏的东汉卧虎盖三足石砚，雕琢略显粗拙，装饰的几何纹也不精致。但是，其主题纹样盘身回首的卧虎有着夸张的虎鼻、宽大的虎背、饱满的后腿以及锋利的虎爪，具有一种随时跃起的气势。整件作品雄浑豪放，形神兼备（图1）。

河南南乐县福堪乡宋耿洛村一号东汉墓的龙形盖砚（图2）^[4]，盖上透雕六条相互缠绕的飞龙，龙首攒挤。砚身下承三熊足，皆双耳竖起，瞠目张口，大腹蹲坐，作奋力托举状。攒挤的飞龙、托举的大熊，表现出汉代工艺美术丰富而夸张的想象力，同时也传递出气势恢宏的汉代工艺特点。

汉代以后，由于陶瓷业的空前发展，陶瓷器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陶瓷砚取代石砚成为最主要的砚材。三国两晋时期，由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演变成的三足陶瓷圆砚十分多见。南北朝时，陶瓷圆砚的足数增加。由于当时中国陶瓷主要产地在南方，故北方陶瓷圆砚的使用远少于南方。北方的上层社会流行一种方形带足石砚，其上有精美的雕刻，是东汉三足石砚的续曲。这种石砚在砚堂外往往有耳杯形水池，有的还有笔舔。

迄今所知，最早的瓷圆砚（以青瓷圆砚为主）出现于三国时期的东吴^[5]。西晋出土的陶瓷圆砚有所增加，但总体数量不多，多为三足砚，大多出土于长江下游的墓葬^[6]。

东晋陶瓷圆砚的出土的数量远远超出西晋，出土地域也从长江下游扩展到南方的福建、广东、广西。

两晋陶瓷圆砚的砚面从平坦发展至中央微突，足数以三足为常见。

东晋陶瓷圆砚的出土，虽已扩展至两广等地，但还是以长江下游为主，特别是南京地区占有相当的份额。到了南北朝时期，出土的陶瓷圆砚则广泛分布于南方诸省，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都有相当数量的出土。

南北朝陶瓷圆砚的砚面大多中央突起，呈弧形。有的砚面中央甚至高出口沿。足数增加，由三足逐渐增至五足、六足、十二足甚至十四足。

三、隋唐名砚与隋唐基本砚形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砚在材质与砚形两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后世盛传的唐代名砚有端砚、歙砚、红丝砚与澄泥砚等。但是，具体情况与传说有一定的差异。

端石主要出产于广东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端溪水一带，唐代肇庆属端州，故名端砚。唐代文献中已有关于端砚的记载，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句，是对端砚的赞美。刘禹锡《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皮日休《以紫石砚寄鲁望兼酬见赠》等也是关于端砚的诗歌。唐李肇《国史补》云“内邱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更是对端砚褒奖有加。以上这些诗文的创作年代在中唐和晚唐。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表明唐代已经开采端石。如1997年广东广州淘金坑唐墓^[7]、1952年湖南长沙仰天湖第705号唐墓^[8]、1965年广州市动物园麻鹰岗唐墓^[9]等多有端砚出土。据研究“这些唐代墓葬都属晚唐，初唐和中唐时期不论是遗址还是墓葬都不曾有关端砚的报导”^[10]。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端溪石砚是从中唐以后才具有规模的开采，晚唐开始流行。

与端砚比肩的歙砚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此地唐时属歙州，故名歙砚，又称龙尾砚。1976年，安徽合肥机务段唐开成五年（840）刘玉墓出土一方^[11]。北宋唐积《歙州砚谱》云：“婺源砚（歙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于端溪。”记载表示，唐代开



图1



图2

元年间有猎人采歙石为砚。但此为宋人追录。鉴于歙砚在唐代出现仅为个例，并且没有唐人记载，所以说，这一时期，歙砚只是身影初现。

红丝砚产于山东青州，其色红、黄相间，常有红色纹理，故名。红丝砚在这一时期既无考古出土亦无唐人文献佐证。

端、歙、红丝皆为石砚，而澄泥砚是一种陶砚，用经仔细淘洗、过滤的细泥加坚固剂做成坯块，风干后雕琢为砚形，烧制而成。澄泥砚具有相当的耐磨性，且不易渗水。其产地主要在北方。南唐张洎《贾氏谭录》云：“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这是澄泥砚制作法的最早说明。传统的说法认为唐代已有澄泥砚，考查考古资料，1983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有唐早期的龟形澄泥残砚。馆藏唐龟形澄泥砚底有“开方”两字，“开方”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开方村，是虢州澄泥产地。综合文献与考古两方面因素，既然五代已有关于澄泥砚的制作方法，唐代已有澄泥砚的个例，说明澄泥砚在唐代已经产生，但并不普及。

综上所述，传说中的名砚在这一时期只有端砚较为流行，那么，隋唐五代砚所用材质情况如何？笔者在《隋唐五代出土砚》一文中下表：

隋唐五代出土砚材质统计表

材质 数量	端石	歙石	石	陶	澄泥	瓷	陶瓷
件数	5	1	11	56	1	26	2
百分比	4.9%	0.98%	10.78%	54.9%	0.98%	25.49%	1.96%

从统计表可知，隋唐五代出土砚的材质主要是陶瓷与石。唐代的名砚中，红丝石砚不见踪影，歙石砚与澄泥砚只有一方，端石砚与疑似端石砚共计5方，在所录出土砚中比例甚微。这或许有报告者对出土砚的具体材质了解不充分的因素，但所谓的名砚在唐代并非主流，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隋唐五代时期出土的石砚大概只占10%左右，各类陶、瓷砚占比超过80%。

由此看来，文人对砚质的追求在隋唐五代只是刚刚拉开了序幕，实用的陶、瓷砚和开采相对容易的普通石砚才是舞台的主角。

在砚形上，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流行圆形多足砚与箕形砚。前期以圆形多足砚为多，中唐以后箕形砚开始占主导地位。圆形多足砚大多为陶瓷制品，在南北朝多足圆砚的基础上，足数进一步增加，并且发展出圈足砚。隋唐流行的周沿水槽凹陷的辟雍砚也是多足砚的演变，是圆形多足砚的主流。唐中期以后随着箕形砚的兴起，圆砚随之衰落。到了五代，在出土砚中迄今未发现圆砚。箕形砚大多为陶质和石质，其形如簸箕，出现于唐代。箕形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式，砚首稍圆，上窄下宽，内凹，砚尾弧形，有二足；二式，砚首弧形，组成砚的几个平面钝角相交而产生折痕，有二足。此两种箕形砚以一式为多，二式较为少见，时代亦偏晚。五代的砚形以箕形砚为主，且多见二式箕形砚。

除了圆形多足砚与箕形砚外，该时期还有少量方形砚、龟形砚和山形砚出土。

四、宋砚的艺术特征与宋代名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推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文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文人雅士的审美意趣和价值取向渗透进艺术活动的方方面面。这种文人气质在工艺美术上表现为含蓄、内敛、自然、淡泊、清新和儒雅的艺术特征。体现在砚（石砚）上是赞

赏自然的石品、石性和简洁、质朴的造型取胜，少有繁缛的装饰，具有端庄、雅致、素净的艺术风格。

北宋米芾《砚史》云：“器以用为功……夫如是，则石理发墨（石性）为上，色（石品）次之，形制工拙（造型）又其次，文藻缘饰（装饰）虽天然，失砚之用。”米芾评砚表明宋人推崇砚的自然属性（石性、石品），其次为造型，而对装饰不屑一顾。

南宋《辨歙石说》一卷专门介绍歙石的纹理（即石品），如细罗纹、粗罗纹、暗细罗纹等，计有27种，描述可谓详实。

南宋《端溪砚谱》一卷叙述端砚的产地、石品、石性、石病及48种砚式。文曰：“大抵石性贵润，色贵青紫。干则灰苍色，润则青紫色。眼贵翠绿圆正、有瞳子……眼赤黄皆下品也。”其对石性、石眼的优劣评判影响至今。48种砚式记录了端砚的种种造型，其中风字砚就分为平底、有脚、垂裙、古样、琴足等5种。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录了红丝砚的石品、石性。云：“唐彦猷……嘉祐中守青社，得红丝石于黑山，琢以为砚。其理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或如山峰，或如云雾花卉。石自有膏润，浮泛墨色，覆之以匣，数日不干。彦猷作砚录，品为第一，以为自得此石，端溪、龙尾，皆置不复视矣。”赞美了红丝砚自然属性。

类似记载在宋代砚录类文献甚至文人笔记中多见，多是对砚石（亦有个别澄泥、玉等）产地、石性、石品、砚形的描述，甚少提及砚的雕琢与纹饰。这与宋代文人的艺术情趣是完全吻合的。

由于重视砚的自然属性，材质出众，色泽、纹理上佳的名砚引来文人雅士的追捧。宋代文献中，对名砚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所谓“端、歙、澄泥、洮河”四大名砚。同时，考古出土的名砚也比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增多。

在唐代初展风姿的端砚到了宋代更受推崇。南宋《端溪砚谱》是端砚的专著，南宋高似孙《砚笈》四卷第一卷专论端砚，分论端石砚坑、石眼、石病等。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古砚辨”一节，对端石的下岩、中岩和上岩描述细致。宋代的诗歌中亦有咏颂端砚的，苏轼有《端砚铭》，曰：“千夫挽纆，百夫运斤。篝火下继，以出斯珍。”是关于端石开采的实录。刘克庄《获砚》云：“二砚温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马肝紫润犹宜沐，鸽眼青圆宛似生。”是对端石石性、石品的赞颂。另外王安石有《元珍以诗送绿石砚所谓玉堂新样者》，文同有《谢杨侍读惠端溪紫石砚》等等，对端石赞赏不已。考古资料中，宋辽金出土的端砚数量有近二十方，如1958年广东潮州北宋刘景墓^[12]、1988年安徽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妇合葬墓^[13]皆出土抄手端砚，除了抄手形，还有圆形、葫芦形、琴形、箕形等，大多无装饰纹样。出土地点有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川等南方地区，说明端砚在南方已十分普及。

歙砚在宋代进入了繁荣时期，官方曾组织多次开采，开挖的砚坑与收获的石品数量众多。歙砚兴盛的程度在文献上得到充足的反映。《歙州砚谱》、《辨歙石说》、《歙砚说》等专著，对歙砚的缘起、砚坑、石性、石品和砚形的记载详尽，是了解其历史和宋代歙砚基本情况的珍贵史料。宋代文人在诗歌中对歙砚也是不乏赞扬之词，黄庭坚《砚山行》是考察龙尾山歙石的诗作，云：“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把歙石的石性（不轻不燥）与君子的品德互比，认为歙石的石品（金星）与青碧的石色胜过端石。苏轼有《龙尾砚歌》，蔡襄有《徐虞部以龙尾石砚邀予第品仍授来使持还》，对歙石评价颇高。考古出土的歙砚有近十方，主要是抄手形，亦见有圆形、椭圆形等，大多无饰纹。1988年安徽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抄手歙砚^[14]，石色青莹，石理缜密，出土时置于漆砚盒中，是墓主人的文房伴侣。2005年江苏金坛茅麓镇石马坟北宋墓出土的抄手歙砚^[15]，有精细紧密的犀角罗纹。出土地点大多在安徽以及邻近的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地。

澄泥砚到宋辽金时期已十分兴盛，产地扩大，在北方的绛州、虢州、泽州（今山西晋城）、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山东的柘沟镇以及淮河流域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等地都有生产。已经出土的澄泥砚有十几方，出土地点集中在北方，如河南、山东、内蒙古、北京等地，南方的湖南，以及长江下游的安徽潜山、江苏宝应亦有发现，砚形为抄手形、箕形和圆形等。许多澄泥砚上还留有制造者的名款。如江苏宝应北宋墓群出土的一方抄手澄泥砚^[16]，砚背有两行模印文“濠州刘家澄泥造□”，辽庆州古城的长方八角形澄泥砚^[17]，底模印“西京仁和坊李让”、“罗土澄泥砚瓦记”。

宋代的另一名砚是产于甘肃的洮河砚，所用洮石产于甘肃洮河沿岸，故名。洮河砚开采于宋代，其绿如蓝，润如玉，颇受宋代文人的青睐。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砚辨”中有“洮河绿石砚”记载：“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黄庭坚《刘晦叔许洮河绿石研》曰：“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另外，苏轼有《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亦对洮河砚大加赞誉。只是因产地偏远，开采困难，运输不便，这一时期出土砚中没有洮河砚。

在砚形上，唐五代流行的箕形砚在宋代已逐渐稀有，而北方的辽金则更多继承了箕形砚的传统，并发展出从砚首至两侧边有凹弧形装饰带的箕形砚和带有各种台座的箕形砚，富有辽金的时代特色。宋代以抄手砚为主流，由唐代箕形砚演变而来。宋代的抄手砚砚首略窄，砚尾略宽，三侧壁呈收敛之势，具上天下小之感，砚的截面为梯形。

五、元明砚的相关问题

中国砚史发展至宋辽金时期，虽然某些砚上出现了装饰纹样和刻铭，但整体来说，元明以前的砚还是以实用为主。元明时期，砚发生了许多变化，逐渐脱离实用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与实用兼有的工艺美术品。由此，砚形变化多样，已不复固定的样式。

元明砚的材质有石、陶、瓷、铁等，石砚在明代更为多见。石材成了砚最主要的原料，结束了长久以来石、陶（瓦）砚并举的局面。在石材中，由于明代停产歙石，洮河石产量少而开采困难，端石成为石砚中的首选。端石的质地、石品受到更多的关注。可以说，端砚成为砚中翘楚始于明代。

属于陶砚范畴的澄泥砚继续烧制，但烧制工艺在明代有很大改进，已有多种澄泥佳品。瓷砚的制作在明代也盛行一时，多数是景德镇民窑烧制，以青花为主，砚形大体为圆形或长方形，纹饰以龙凤或缠枝花卉居多。

玉砚在明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造型雄浑、浑厚，素面或饰纹较少，用来琢制玉砚的玉质并非上等，以青玉、青白玉为主，含有较多杂质，透明度不高。

元明砚的造型有承袭早期的箕形、抄手形、长方形、圆形等，也有各种富有个性的样式。风格浑厚古朴，明快简洁，端庄大气。砚形多样化的倾向，昭示清代各款砚形百花齐放局面的到来。

石砚的雕刻技艺也颇有特点：一般以浅浮雕凸现纹样，辅以阴刻，有的适当穿插深刀技法。琢制的图案具有生动雅致、简练流畅、浑厚而富于变化的特征。

题铭石砚在元明有较多出现。大多镌刻于砚底或砚侧，刻铭较之前代有增长的趋势，铭文内容也有增加。

元明石砚的纹样题材已十分广泛。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走兽等多有表现，其中尤以云龙、龙凤、双凤、松鹤、竹节、荷叶、仙桃、灵芝、秋叶等纹样居多。还有取自中国传统图案的题材——蓬莱与兰亭，后世称为蓬莱砚与兰亭砚。

刻画蓬莱仙岛的即为蓬莱砚，一般呈长方形或椭圆形，砚材有洮河石、端石、歙石、澄泥等，以绿色的